

马克思主义研究

后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

牛锦红^{*}

〔摘要〕 后马克思主义宣称他们的理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之中,但是,不遗余力地撕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叙事方式,使得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等理论其实无关,无可撼摇的法律理论根基与正当性基础荡然无存。由于后马克思主义撕裂并消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联,赋予法律“政治”本体论属性、把“话语”看成是“法律”生成的主要元素,同时认为“法律”是伴随人类永恒存在的社会事实等认知,严重腐蚀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根基,后马克思主义对“法”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相去甚远,偏离多于继承。

〔关键词〕 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法理脉络;撕裂;消解;话语

“后马克思主义”最早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的一些西方论著中,是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而出现的概念,它主要反映的是当今西方一些赞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态度。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学术思潮逐渐为我国政治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研究关注,然而,我国法学界鲜有对其涉足。的确,从严格意义上说,后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提供出明晰的、具有体系化的法律观点,不过,我们完全可以凭借法与政治之间的逻辑勾连关系,从他们的政治认知解读出其法律主张。通过探究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源起,剖析后马克思主义的法理脉络,不仅可以增加对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深度,而且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的认识也具有特别的价值。

一、生产方式: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的根基

从对黑格尔法哲学的追随、质疑再到祛魅以及在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总体批判过程中,马克思完成了新唯物主义的 legal 思想与法理脉络的建构。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体系中,不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而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在黑格尔看来,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是伦理观念发展的三个阶段和表现形式。他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在道

^{*} 历史学博士,法学博士后,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450046。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政治规矩’的缘起与践行路径研究”以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百年中国城乡规划法律问题研究”(13CFX035)的阶段性成果。

德方面存在较大缺陷,而国家体现了绝对正义与公平,有较高的道德性和自由性,是完美的化身。因此,黑格尔认为国家与法决定了市民社会,国家这种上层建筑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础,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社会的经济关系是国家与法派生的东西。客观地说,对于黑格尔的这套理论,当时还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马克思并没有太多的质疑。但是,关于林木盗窃问题的辩论对马克思触动很大,这场辩论不仅使得马克思开始怀疑黑格尔“道德和自由体现”的国家概念以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论述,而且导致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全部(法)哲学体系的批判。1842年10月,《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一文体现了马克思第一次在现实中接触到物质利益问题,标志着马克思开始关注实际利益纷争在法的制定中的重要作用,也揭示了马克思主张的法与法律是从物质关系以及人们由此而存在的斗争中产生的。之后,马克思不断提出必须承认物质关系、历史条件、市民社会以及各种形式的斗争对法的产生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残酷的事实,使得马克思清楚地认识到“伦理国家”被私人利益所裹挟已经走向堕落,因此,马克思退出《莱茵报》之后,再也不能容忍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思辨理论。他通过阅读早期资产阶级作家和启蒙主义学者的理论著作,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从而彻底解决市民社会与国家和法的关系问题。众所周知,黑格尔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只不过是国家的两个有限领域,一旦国家超出这两个有限领域则成为“自为的无限的现实精神”。^①但是,无耻的国家和荒唐的法律打脸了黑格尔的“绝对观念”。相反,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才是人类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的现实基础,作为国家权力基础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他们本身来理解,相反,他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条件,这种物质的生活条件的总和,黑格尔……称之为‘市民社会’”。^②这一观点彻底颠倒了黑格尔关于法的“主词”和“宾词”二者的关系,即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提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理论根基基本形成,马克思确定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和法的唯物主义法理脉络。

这一理论根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表达得更清楚和更准确。在这一标志新唯物主义成熟的作品中,马克思很少再使用“市民社会”这一词义含混的范畴讨论国家和法的问题,而是从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逻辑角度论证了“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系统阐述了法的由来以及法的阶级属性。在马克思看来,法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它的出现更不是纯粹偶然的现象,其内容也不取决于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它不过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而已。按照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来,获得经济上统治地位的阶级往往在政治上必然取得其统治地位,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全部面貌。因此,为了能够保证经济、政治的双重统治,占统治地位的“个人除了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外,他们还必须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种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即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表现,就是法律。”^③马克思的这一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表达得更为精炼、准确。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④也就是说,法律是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自身利益而制定的,法律受物质生活制约,至此,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其法理脉络已经成熟。

①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综上,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理论根基及法理脉络十分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第一,不是国家、法律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第二,作为上层建筑组成元素的法律当然地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它的生成、变化都受制于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以及具体社会中的物质生活条件,即生产方式是法律产生与发展的根本因素。第三,法律起源于私有制和阶级斗争,其本质上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统治阶级的意志,因此,它最终会因为私有制和阶级的消亡而走向终结。

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法学观的批判,澄清了法学研究领域中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即法的客观性及其本质。他用“市民社会决定国家与法”的法哲学精神揭示了生产方式对国家和法的决定作用,这一思想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从根本上揭开了政治与法律众象的面纱,为历史唯物主义法学观奠定了基础。总之,离开生产方式,没有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法律就失去了产生与发展的根基,所有统治阶级都不能任意地创造法律。坚持法律的物质性、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与唯心主义法律观的根本区别,也是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的理论根基。

二、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的内核

在西方法哲学体系中,自从结束了“自然状态”、自然法被实然法取代之后,法与法律凭借其至上性、普遍性、客观性和合理性获得了在政治、权力面前的优先地位,换句话说,由于法与法律对政治及权力的先在规定,因此,人们在阐述其所诉求的政治信仰与权力观的过程中,必然表达出其对法与法律的认知立场与原则,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在其政治诉求中不断呈现,并具有完整的法理脉络。

首先,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撕裂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紧密关系,表明法律不具有物质性。尽管后马克思主义学者总是口口声声地宣称他们的理论内在于马克思主义的谱系学之中,但是,不遗余力地撕裂基础/上层建筑的叙事方式,使得他们的理论往往与“‘阶级’、三个层面(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或者作为被沉积下来的盲目崇拜对象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关系这些方面无关”。^①撕裂基础/上层建筑、放大上层建筑的解释功能在阿尔都塞的文本中已经存在,不过,当阿氏主张多元决定的同时,他依然眷恋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具有最终决定作用的合法性。拉克劳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与《共产党宣言》中存在的所谓相悖的逻辑论述关系,指出生产力在最终意义上必然占有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种武断的教条。在此基础之上,他还借助“对抗”、“认同”等概念进一步解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他看来,生产关系不但不能由生产力决定,相反,生产关系具有不断被来自外在力量建构同时能够阻止生产力无限发展的特质。相比拉克劳完全、直接地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态度,詹姆逊则委婉、似是而非地最终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终结性”的消解。詹姆逊指出“经济基础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或原因”^②,他认为“生产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有生命力的领域,他把“生产模式”作为推动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但詹姆逊并不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来使用这个概念,他深受阿尔都塞的多元论决定思想的影响,认为生产方式由相对独立又相互影响的不同层面构成,其中经济因素固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它与政治、文化、宗教等其他因素也都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决定力量,因此,应该将“生产模式”作为结构性总体看待,这一结构性总体,既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也包括政治、法律、文化与宗教等。詹姆逊进一步指出,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实际上是由多种生产模式共存的结构所决定的,而各种生产模式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共存的不同生产方式已经明显敌对的时刻,他们的矛盾

^① [英]恩斯特·拉克劳、[美]查特儿·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严树广、鉴传今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页。

^② [美]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已经成为政治、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核心时刻。”^①因此,詹姆逊认为生产模式之间的斗争是最重要的,“生产模式”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它决定了该时期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性质和变化。如果说以拉克劳和墨菲为代表的右翼后马克思主义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进程,更否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而以詹姆逊为代表的左翼后马克思主义则试图把马克思主义拉入自己的阵营,一方面肯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理论,另一方面又对其进行“后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最终以“变异”的“生产模式”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②这样一来,詹姆逊很巧妙地将生产领域的阶级对抗和从属关系转换成多种生产模式的矛盾关系,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的消解,从而动摇了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根基。

其次,后马克思主义通过重塑“政治”的地位,表明法律具有政治本体属性。实现“生产方式”的消解之后,对于后马克思主义来说,赋予“上层建筑”(包括法律、文化、宗教等在内)“政治”的本体特质就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柯林斯在其代表作《马克思主义与法律》中很暧昧地说出了“法律既在基础的层面又在上层建筑的层面发生作用,而不能被归入一个社会形态的边缘角色”^③的看法。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应该抛弃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模式,原因在于人们从一个物质基础概念中排除上层建筑现象是可能的。作为元规范性的法律与其他习惯不同的是它一直存在于紧密调整生产关系的位置上,因此,“起初是上层建筑的法律作为规则来规制物质基础,并且,因为他们使得习惯与社会行为变得不相干,法律规则实际上构成、定义并表达了生产关系。”^④与柯林斯的暧昧不同,墨菲提出了十分激进的观点。在墨菲看来,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⑤为了进一步说明法律等现象具有“政治”的本体属性,她将“the political”和“politics”进行区分,认为“the political”涉及到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对抗维度,它是“politics”观念的诞生之地。这种区分显然不是墨菲首创,但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完成政治向古典意义上的回归,赋予了政治本体属性与永存性。她认为,一旦承认了“政治”的本体属性,那么,对于社会而言,“不可能再提终极的保障和一种确定无疑的合法性,因为权力不再体现在王族身上并与超验的权威相结合。因此,权力、法律和知识都要遭受激进的非决定论者的折腾”。^⑥也即国家与法律不受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以政治为本体,从而完全否定了法律的物质性。

再次,后马克思主义通过否认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和阶级对立,表明法律具有永久性。当重新注释“生产方式”、“上层建筑”,并撕裂基础/上层建筑之后,后马克思主义“不再可能主张马克思主义阐述的主体性和阶级概念,也不可能继续那种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历史过程的幻象,当然也不能再继续没有对抗的共产主义透明社会这个概念”。^⑦很明显,在后马克思主义看来,一旦否定和抛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那么就可以终结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凭借经济一元论的范畴寻求获取本质或深层历史意义的努力;一旦放弃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地位和阶级对立,那么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共产主义”就成为乌托邦的幻象。既然“共产主义”是人类无法企及的乌托邦,那么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宣称的法律灭亡也就不再可能。设若“共产主义”可能实现,但“the political”涉及到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的对抗维度告诉人们,即使在一个严密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冲突和越轨行为,因此,在柯林

① [美] 杰姆逊:《政治无意识》,王逢振、陈永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83页。

②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解构还是僭越?》,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83页。

③④ [英] 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邱昭继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81、89页。

⑤⑥ [美] 查特尔·墨菲:《政治的回归》,王恒、戴佩洪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2页。

⑦ [英] 恩斯特·拉克劳、[美] 查特尔·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4页。

斯看来,“现代法律体系的零碎的复杂的东西将在共产主义社会消失,而不是法律通通消亡。”^①

综上,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清晰可见,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应该彻底放弃“历史的必然性”、“工人阶级的优先地位”等理论,放弃传统左派以“阶级压迫为核心的诉求”,解构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赋予政治本体论特征,认为政治、法律、宗教等都可以和经济基础有一样的作用,只有借助“霸权”才能走向多元民主政治。后马克思主义不仅撕裂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也最终对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和阶级性进行了“终结性”的消解,法律的根基也荡然无存。那么在后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法律生成的真正动力何在?

三、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的生成原子

撕裂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决定与被决定的关联性,无可撼摇的法律理论根基与正当性基础已荡然无存,同时,能足以代表社会的中心亦付之阙如。在这种情境下,索绪尔的“话语”被后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法律”生成的基本单位。拉克劳和墨菲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一书中建构了“话语理论”体系,何为“话语”,他们提出:“我们把任何建立在要素之间关系的事件称之为链接,而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视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总体化,我们称之为话语。”并推论出政治在本质上由话语生成的结论。^②关于“话语”与概念生成之间的逻辑关系,福柯在其《知识考古学》中有过生动的描述,在他看来,“我们只是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上提出问题,话语不再是外部的表现,而是概念出现的地点;我们没有把话语的常数同概念的理想结构联系起来,但是我们在话语内在的规律性的基础上描述概念的网络。我们没有让陈述的多样性服从于概念的一致性并让它服从于后一历史的理想性,我们建立的是相反的系统:我们把非矛盾的纯目的重新置于一个概念的相容性和不相容性互混交错的网络中。而我们把这个复杂体归结于某些说明话语实践特点的规律。”^③很明显,福柯对传统意义上的真实性、客观性进行了质疑,并认为只能是在相容与不相容的对抗中,由话语建构起来的真实才是实践中的所有真实。

福柯的上述观点转换成哈贝马斯的看法就是:“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存在于由语言构成的日常生活事实性之中”。^④哈贝马斯同政治经济批判的决裂,放弃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分析的系统性矛盾对现实制度的批判以及对“话语”功能固化与强化的思维范式,使得他的交往行动理论和法律理论让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生成,并从中受益匪浅。在哈贝马斯看来,人们只有按照交往行为理论、借助话语商谈才能真正抓住法律生成之真谛。即:根据商谈原则,“公民可以验证那些他们相互赋予的权利。作为法律的主体,他们必须以法律媒介本身锚定这种自我立法的实践;必须在法律上把使用商谈原则的交往条件 and 政治意见与意志形成的程序予以制度化。由此,借助于平等的个人自由这种普遍的权利而建立法律代码,必须通过行使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而得以实现,这些交往权利和参与权利保障为交往自由的公共运用提供平等的机会。由此,商谈原则便获得了民主原则的法律形态。”^⑤很显然,在这里,哈贝马斯想要做的就是用商谈或协商模式代替卢梭的契约模式,运用话语商谈使得法律得以自我构建。不过,由于过分强调“话语”的功能必然使得这种“革命性”的法律理论存在着先天的与致命的不足,那是因为“语义上到处都充斥着流动不居的和争论不休的词汇、聚讼纷纭和‘势不两立的概念’、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关于同意与异议的错综复杂的构造以及并驾齐驱和彼此抵牾

① [英]休·柯林斯:《马克思主义与法律》,第116页。

② [英]恩斯特·拉克劳、[美]查特儿·墨菲:《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114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67页。

④ [美]马修·德芙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高鸿钧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6页。

⑤ [美]马修·德芙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第185页。

的解释”。^①

齐泽克正是利用了“到处都充斥着流动不居的和争论不休的词义、聚讼纷纭和‘势不两立的概念’、模糊不清和自相矛盾的观点、关于同意与异议的错综复杂的构造以及并驾齐驱和彼此抵牾的解释”的话语陈述了有关“法”之门的寓言。在《超越话语——分析》一文中，他借助卡夫卡的《审判》中的情节向人们展示了“话语”在“法”中的强大力量。他透过约瑟夫、守门人、洗衣女工以及法官等之间话语的矛盾性与对抗性，运用列维·施特劳斯、拉康、弗洛伊德等人的理论对“法”进行分析。齐泽克认为，在传统的视角中具有纯粹中立的普遍性的“法”本身，由于受到低级庸俗生命活力的玷污，它已经成为了任人摆布的玩物，因此，法庭根本无‘法’可依，那种试图通过逻辑推理建立法庭功能的模式早就荡然无存，进而他表达出“真正专制主义的危险来源于‘法’开始复活的时候”，“根本不存在任何真理的真理：‘法’的所有保护者都具有同样的地位，‘法’并没有支持任何真理，非真是必然的”，“如果‘法’不是基于真理，那么它就包含了欢乐”^②等一些具体的观点。话语的隐喻使得“法”只能依赖政治、道德等“他”者关系建立起来，并且不断地被改变中。

按照后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对象从来都不是纯粹存在的实体，他们只是在话语实践中表现出自己的存在，因而所有的主体与事实都是“话语”建构的结果。如德里达、福柯等人都致力于对主体的消解，德里达否定主体在语言中的直接在场作用，福柯则提出“人之死”的概念否定人的主体性。后马克思主义认为语言决定主体，决定主体行动的取向，也决定社会结构，而福柯则发挥了罗兰·巴尔特关于权势隐藏在语言中的观点，进一步揭示隐藏在话语之后的深层结构——权力关系，那就是谁在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操纵话语的言说方式，从而赋予了海德格尔“不是人说话，而是语言说人”新的理解。在话语是权力的产物这个理论前提下，“语言说人”意味着主体的消失。^③追随这种理路，人们自然会接受“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形成以及彼此之间的对立也只是话语建构的结果罢了。“显然，在这样的民主话语中，任何一个主体都不能享有特权并成为政治活动的中心，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不确定的和偶然性的逻辑中被话语建构起来的结果。因此，主体所呈现的最明显的，也是最根本的特性就是被分散化和零碎化。”^④因而，在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政治空间的框架内，应该抛弃意识形态斗争的主轴，应当“根据法律的规则，重新断言悬置起法律的中立空间之必要性的旧左翼信条”。^⑤不仅如此，“话语”在事实上更成为指认“罪与非罪”的工具。例如，齐泽克认为在纳粹主义者眼中，犹太人仅仅因为他是犹太人，即因为话语定义的自然属性“他是谁”，所以犹太人是“有罪的人”。因此，齐泽克说：“纳粹主义……它把社会对抗置换或中立化为种族差异，犹太人仅因他们是犹太人这个简单的事实而感到有罪，并不管他们做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主体化他们的现状。”^⑥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以“话语”否认主体，在某种意义上对传统法律主体理论进行了颠覆。后马克思主义认为只要借助于一种后现代的话语逻辑，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许多积极方面将会在解构中幸存下来并在新的建构中焕发出新的生机。

四、结语

正如上文所述，在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陈述中鲜有对“法”的专门阐释，我们只能借助“家族相似”进行“症候阅读”，自然推导出后马克思主义对政治、民主以及权利等表现出来的态度其实就是

① [美] 马修·德芙林：《哈贝马斯、现代性与法》，160页。

② [英] 恩斯特·拉克劳：《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孔明安、刘振怡译，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3—314页。

③ 曾枝盛：《后马克思主义：解构还是僭越？》，第48页。

④ 卢春雷：《霸权、话语建构、反极权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空间转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⑤⑥ [斯洛文尼亚] 齐泽克：《敏感的主体》，应奇等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52、259页。

他们对待“法”的态度。尽管一直声明自己在马克思主义谱系之内,但是,由于后马克思主义主张撕裂与消解基础/上层建筑关联并赋予“政治”本体论属性、把“话语”看成是“法律”生成的主要元素,同时认为“法律”是伴随人类永恒存在的社会事实等认知,已经严重腐蚀了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根基,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后马克思主义对“法”的主张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相去甚远,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及法理脉络的偏离多于继承。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观念不仅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法律之后,更多地意味着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某种否定和解构。后马克思主义有不少攻击、修正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内容,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法律理论是一种严重挑战,正如英国学者拉弗蒂所言:“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阶级政治采取了一种十分草率的态度,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国家、市民社会的洞见,对今天的争论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①同时,后马克思主义的“话语”理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理论,“构建马克思主义话语权,必须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重点要齐心协力打牢根基,研究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基本观点;要宏微兼顾关注现实,系统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要旗帜鲜明把握方向,领会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要集中攻关重大思想理论问题,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②

另一方面,后马克思主义力图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过程及其内在逻辑,其新的思考及其在某种程度上对马克思主义法律批判精神的继承值得我们关注。后马克思主义对于法的分析,对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法无疑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他们批判马克思主义法律体系内部存在某些缺陷,某些原理已经过时的言论虽然显得尖锐刻薄,但是我们在驳斥他们论点的同时,后马克思主义的法律思想也为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律体系带来较多的启示和思考。因此,对其加以认真研究并有所回应,是我们严肃对待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体现,是在新的时代、新的高度上升华对于马克思主义法律思想的当代性与创新性的体悟,也是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选择。

(责任编辑:杨嵘均)

Legal Thoughts and Jurisprudential Logic in the Context of Post-Marxism

NIU Jin-hong

Abstract: Post-Marxists claim that their theory is inherent in the genealogy of Marxism, but their way of theoretical narration spares no effort to separate the economic base from the superstructure. This makes their theory have little bearing on Marx's theory concerning such issues as the class, the three basic strata consisting of economy, politics and ideology,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duction relations, thus greatly undermining the foundation and legitimacy of the legal theory. The Post-Marxism has severed and dissolved the dialectical connection between the economic foundation and the superstructure, endowed law and politics with an ontological status, and regarded discourse as the main element for the generation of law.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holds that law is a permanent social fact in every type of human society. All this has seriously corrod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Marxist legal theory in that its legal ideas are alien to the Marxist legal thoughts and jurisprudential logic. It deviates more than inherits from the Marxist legal theory.

Key words: Post-Marxism; law; jurisprudential logic; separation; dissolution; discourse

① [英] 乔治·拉弗蒂:《变化的动力:阶级、政治和市民社会——从马克思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舒畅译,周凡、李惠斌主编:《后马克思主义》,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305页。

② 张杨乐:《马克思主义话语权考辨及其实踐路向》,《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